

音边时刻

(日) 内山嘉吉 奈良和夫著

K825.6
96

鲁迅与木刻

〔日本〕内山嘉吉 奈良和夫著

韩宗琦译 周燕丽校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 · 北京

鲁迅与木刻

著者 内山嘉吉 奈良和夫
译者 韩 宗 琦
校阅者 周 燕 丽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平 野

装帧设计：曹 洁

印刷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85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27·9188

定价：3.10元（精装） 1.80元（平装）

《鲁迅与木刻》中译本序言

前年，我参加1981年9月鲁迅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大会，我们承蒙贵国招待出席了各种纪念活动，这是我一生中的荣幸，非常感谢。

关于我和奈良和夫共著的《鲁迅与木刻》，是我们在日本为纪念鲁迅先生而出版的，此次经过邵宇先生和沈鹏先生的热心努力，能在贵国由韩宗琦先生翻译，并由周燕丽女士校译，终于将由中国国家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付印和出版，更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拙著在《日中》杂志自1972年6月号至1973年2月号连载之后，多次想作原稿的补充，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感到惭愧。例如李平凡先生在战后的日本向日本人民宣传介绍中国版画的事迹，叙述得非常不够；对于其他一些感人事迹，也迟迟未能动笔，实在感到不安。

我于前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归国后，即感到身体疲劳过甚，卧床甚久。而去年三月，两眼视力又发生障碍，走路无人扶着，即感眩晕，不必说，拿笔写作也受到病躯的限制，因而应给贵国朋友们的修件也

一直不能动笔，深感遗憾。但即使奋笔写出，也会笔划零乱，很难使人看懂，以至对各方面都一时断绝了音讯。

由于以上处境，再加上今年元旦因肺炎入院治疗，虽说于一周前出院，但因住院期中从早到晚不断打点滴和血浆注射，以及静脉注射抗菌素，或肌肉注射等，每天要持续到晚九时。所以已准备好的贺年片，都一概未能发出，太失礼了。无奈我体质上的欠缺，左臂不能作静脉注射，所以只能靠右臂打针；因而右臂在一个多月的住院期，每天都被注射针占据，甚至有时注射针都刺不进血管，注射失败的事屡屡发生。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文债累累，江丰先生的追悼纪念文也写不成了。

翻译，可以说在文化上是国际公有的一个手段，也是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与提高的一种方式。拙著经过这次修改和补充，十年前在《日中》杂志上连载的旧稿，已不可据。这次拙著的出版如能对中国木刻的发展与友谊有所贡献，实在是一幸事。我衷心祝愿中国新兴版画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内山嘉吉

1983年2月27日于东京

代 序

——编写本书的缘起

内山书店是研究现代中国最有条件的地方，而我则一向疏懒，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当然也有些客观原因，即在战败不久的日本，中国研究家还不多的那个时期，由于日中两国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由中国进口更多的书刊，即使能进口一些，也是尽先供给研究家或读者，我所需要的书和杂志就只有推迟到以后再说；可是一旦再另行订购时，就常常碰到售罄的情况。在我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有关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木刻的书和杂志当中，在书库里有缺货的，偶而还有由于断续订购所缺期的杂志。解放后的中国美术书籍，尤其是56年10月号创刊的《版画》杂志就是如此；其中也有象《鲁迅日记》一书，是受到特殊优先照顾到手的。

这是研究鲁迅的各界人士非常重视的一部书，它对于我也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每天只有两三行的记事，但却具有卓越见地的研究和证明的材料；特别具有贵重资料价值的是，每年记事的末尾都详尽地记有当年购进图书的记录。

从1912年开始至最后逝世的记录中，我摘记出和艺术、艺术有关的记事，其中有欧美的书刊，但大部分是日本出版的日本人士的著作或译本。对于古碑的典籍和中国古人的著作，我虽然没见过实物，并且缺乏这方面知识，因而无从插手；但对于日本出版物，却有不少是从我贫困时代开始，就已收集并保存至今的，所以常有以“啊，这个鲁迅先生也有……”而感到欣慰。

在这样摘录书目的过程中，我感到必须研究鲁迅先生购进的图书对于他一生中的著作和美术活动起过多少作用。

72年春，我应《日中》杂志主编光冈玄之约，以“中国初期现代木刻与我”为题，写回忆文章。那时曾设想与前述的研究工作一起进行，但一直没有付之实现，仅只决定写下我所体验的中国初期木刻和鲁迅先生的回忆，作为一种素材，准备以后再加以充实。因而给《日中》杂志写下了以回忆为中心的记事。

文章写完以后，现任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斋藤秋男先生以及其他知交纷纷劝我尽快出版单行本；但是如前所述，决定把后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有了眉目时再写材料，所以虽然感谢各方面的厚意，却也日复一日的拖延下去，一直不曾动笔。

这期间，适逢此次与之合作写书的奈良和夫先生。这是在一次《日中》连载结束的讲演会的会场上，有些人留下来，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奈良和夫也是其中的一位。这

时才知奈良和夫已先于我，着手我所设想的工作了。

奈良先生在败战后减少的旧书店里，专心致志地搜寻鲁书购书目录中所载的同类书籍，而且是以高价陆续购进的；此外，对于鲁迅先生的手迹，从新闻、杂志一直到国会图书馆，凡是能搜求到的地方，也都是遍搜穷索，抄写复制，真是一位手脑并用的笃学之士。

我接受了斋藤秋男先生的热心建议，和奈良先生合作，把我的文章和奈良先生的著作共同出版，并且得到了早期和斋藤先生同为研究所所员的野原四郎先生的“侧翼支援”，代为联系出版社。

这就是本书共同编著的起因，然而奈良先生的写作日有所进，而我却始终不曾动笔，任凭时光流逝。由于日中两国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其间曾有许多旧日相识的中国版画家，指出了在《日中》杂志连载的我的文章中纰漏和记忆的错误，但订正、补记工作也很迟缓。此点，实在愧对斋藤秋男和野原四郎两位先生。由于出版延误，给“研文出版”的山本实先生也招来不少麻烦，实在抱歉之至，同时对于耐心等待之情，也深表感谢。

198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国正准备于9月25日诞辰举行盛大的仪式、纪念活动，并将出版比过去更完备的鲁迅全集和其它有关的纪念书刊。

在这值得纪念的鲁迅诞辰百周年，本书得以问世，是非常有幸的。关于鲁迅先生在美术和版画方面的活动，日本几乎没有进行什么研究，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探

索。我们热切希望能获得各方面对本书的指正,使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以后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内山嘉吉

1980年12月9日

《鲁迅与木刻》校后记

这次有机会校对《鲁迅与木刻》的译文，感到十分荣幸。在校对过程中，也不时怀念起内山嘉吉先生和有关中日版画友好交流的活动。

时间流逝很快。记得三十七年前的1946年秋天，我们借到了内山嘉吉收藏的中国初期木刻作品，是鲁迅先生赠送内山先生的。我作为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的会员，担任着协会的秘书工作，大家一起积极投入了展览会的筹备活动。平凡同志为协会的负责人，一再向我们强调：这次展览活动，是为了完成鲁迅先生与内山先生的一个共同宿愿，要求大家全力以赴，克服经济上和工作中的一切困难，把展览工作搞好；向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革命版画——中国新兴木刻作品，是为了继承鲁迅精神，大力开展版画的国际交流活动。当时我们为了筹备中国新兴木刻作品在日本战后第一次公开展出，募集资金，寻求会场，设计海报，联系新闻界，印制目录，寄发请柬，编辑《中国初期木刻集》等……，到处奔走，进行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47年2月3日在神户正式开幕；但在开幕日我突然患病发烧，未能出席开幕活动，是我一生中的憾事。记得内山先生打来了十分热情的贺电，认为这是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版画在日本第一次公开展出，有深远意义。这个贺电原件与当时的所有资料原被我

珍藏，料不到十年动乱期间，两次被抄家，至今下落不明。最近，日本亚非语学院院长菊地三郎先生赠我国一批版画交流资料，其中有一份是这次展览会的日文请柬，附译在这里，补充一点史料，对读者是有参考意义的。

《中国初期创作木刻展》请柬

本协会主办的中国初期创作木刻展览会，经关西版画家川西英先生的协助，现在已经商妥就绪。谨订于本年二月三日至二月八日一周间，在神户大丸百货公司六楼大厅举行。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是中国伟大文豪鲁迅先生所手植，又在他的指导下成长和发展，因而能与中国劳苦大众的血脉相沟通，十数年间，狂涛般弥漫于全国各个角落，不但创建了大众艺术的基石，开拓了版画艺术的发展路径，而且肩负了解放斗争的时代任务。这些中国木刻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光荣成果，中国木刻家们永远不会忘记开拓者鲁迅先生的热情指导和功绩。中国木刻家之所以能够结成一个统一的奋斗团体“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也正是他们继承了“鲁迅精神”的体现。

这次所展出的六十八幅木刻，是鲁迅先生生前寄赠友人内山嘉吉先生（内山完造之弟）以求批评的作品（详见本协会将出版的《中国初期木刻集》和《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年表》）。在战前期间，内山先生曾计划过展览，但终因军政当局所迫，竟不能在日本举行。如今已能顺利举办，为着中日两国版画的友好交流，以及今后这种友好交流的正确路线，在这划期的“处女展”中，敬祈先生的光临和指教。（1947年1月30日）

展览会开幕后，观众络绎不绝。最后两天我在会场值班，日本各界观众踊跃参观的情景，至今印象十分深刻。闭幕后，我们一方面在大阪、京都、东京等地继续举办了巡展；另一方面，由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出版了200部纪念本的《中国初期木刻集》，扉页上印着：“献给中国新兴木刻导师鲁迅先生”。这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木刻集，也是我们在海外第一次纪念木刻导师鲁迅先生的出版物。在这一本出版物中，内山嘉吉先生曾为我们写过一篇小传，对我们了解他过去的经历，具有史料价值，今将这篇小传的译文附录在这里：

内山嘉吉自传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冈山县农村一个有四儿三女的家庭里，我是最小的一个。满三岁零四个月，就过继到居住在香港县九龟市的叔父家里，并在那里念完了中学。我们兄弟七人中后来活下来的只有大哥完造、二哥和乎和我三人。三个姐姐以及三哥利作，还在我童年时就都去世了。

从童年起，我喜爱绘画。但中学毕业时，因家境拮据，未能实现自己进美术学校的愿望。中学毕业后，在九龟闲待了两年，后来靠前辈并过从甚密的画家斋田乔先生（二科会会员）的帮助，进入东京。不久因病又回到九龟。大正十二年（1923年）再次去东京，又经当时在千叶县疗养中的斋田先生协助，在千叶县北部利根川附近一个小镇的小学担任教师。其后虽也学习过绘画，但对教学比对绘画更感极大兴趣，尤其热衷于教国语课。

四年之后，应斋田先生所在成城学园小学部的邀请，担任该校

* 美术教育课，同时从事斋田先生指导下的学校儿童剧的研究工作，另外还帮助在该园内由正宗得三郎领导的绘画研究所作了些事，因为这个所是斋田先生创建的。

昭和八年（1933年）秋我离开成城学园，攻习雕塑，参加二科会展出，连续两年入选；后因在上海的长兄完造为输入中国文化，在东京开办了专门经营中国书刊的内山书店，忙于书店的经营业务，再没有作品问世。

从成城时代以来和斋田乔先生共同从事的儿童演剧活动，创作了剧本、短剧等，到今年也已十二年了。

书店虽以单纯专门经营中国图书为特点而有困难，但始终愿为中日文化的交流而奋斗。

版画是我在成城学园任职期间，为指导孩子们而收集作品，除此之外自己没有创作作品。

1931年去上海时，与长兄完造关系密切的鲁迅，为当地美术青年开办了版画讲习会，我在鲁迅帮忙翻译之下讲了课。由于这一机缘，得以了解中国创作版画的发展。

1956年6月，内山嘉吉先生应国际书店邀请到我国访问，在北京、沈阳和上海等地，受到我国版画家们的热烈欢迎。他在北京期间，我作为中国美协的临时译员，陪同内山先生参加了北京的一系列欢迎活动。特别是七月四日夜間，内山先生访问了我的家庭，在我家中会见了阔别已久的江丰同志。当他知道江丰同志即1931年上海版画讲习会听讲生的周熙时，师生在北京的重逢，两人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惊喜，至今仍旧给我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1979年我与平凡同志访问离别近三十年的日本，江丰同志刚从错案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他带病到我们宿舍，一再叮嘱我

们，问候内山先生和日本版画界的朋友们，一定要恢复中断已久的两国版画的友好关系，积极促进交流活动的再发展。内山先生听到江丰同志恢复工作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激动。在日本各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当年六月东京的两个会场，由日本版协、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总会和日本美术家联盟等团体举办了“中国现代版画展”，重新恢复了两国版画友好交流的关系。在开幕日宣读了以江丰同志为首的中国老版画家们的联名贺电，体现了两国版画家的深厚情谊。我们在庆祝会上为内山嘉吉先生与鲁迅先生以及中日两国版画界的友谊祝酒时，内山先生非常兴奋，感慨甚多，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感到鲁迅先生是一位非常富有远见的版画导师，被人们称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是恰当的。他不但领导中国现代版画走出了一条光辉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开创了日中两国现代版画友好交流的新历史。中国版画家们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保证了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与繁荣，我感到由衷地高兴。我愿为今后日中版画的友好交流再尽微力。”

1982年，通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内山嘉吉先生将我国赠送他的两百余幅作品转赠给日本神奈川近代美术馆收藏，由该馆举办了“现代中国版画展”。展览期中，中国版画代表团短期访问了日本，进一步增强了两国版画界的友谊。

在《鲁迅与木刻》中，内山先生简略地谈到过尾崎清次、岛田政雄和菊地三郎先生。这三位日本朋友在战后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为促进中日版画的友好交流，做过大量的辛勤工作，有过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知音者，在这里我应补充一点他们的简历。

尾崎清次先生于1893年2月6日生于日本爱知县西尾市。1915

年在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入学，毕业后于该校小儿科教室任职。1921年就职于神戸市立儿童相談所，1922年开始致力版画研究。1929至1936年，出版木刻画集《玩具图谱》（三卷）、《琉球玩具图谱》等。1934年建立尾崎小儿科医院。1947年与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合作，积极介绍中国新兴木刻，促进中日版画的友好交流。1948年，李平凡同志在日本建立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时，尾崎清次被聘为联络站的日本顾问，致力于全日本中国木刻流动展工作。日本华侨新集体版协与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在日本举办的一百余次展览活动中，其中大多数展览活动是他直接主持的。他一生崇敬鲁迅，埋头工作，在中日版画交流工作中甘当“孺子牛”。1969年重病卧床不起，1979年病逝，享年86岁。

岛田政雄先生于1912年3月31日生于日本鸟取县。1929年于鸟取第一中学毕业，1930年加入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3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1938年到上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1944年又被捕，在上海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地下库被严刑拷问十个月，后因母亲病危被释放。1945年日帝投降后，10月任上海日文报《改造日报》编委。194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强制回国。他在上海曾参观过抗战八年木刻展并与汪刃锋等中国木刻家相识。1947年在日本开始与李平凡合作，在日本积极介绍中国版画。数十年来他除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文艺的论文之外，还翻译过《青春之歌》（杨沫）、《三千里江山》（杨朔）、《沸腾的群山》（李云德）、《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虾球传》（黄谷柳）和《白毛女》（贺敬之）等等。1949年7月，日本共产党艺术家大会期间，在会场举办了木刻展。日共书记长德田球一同志号召日本美术家研究中国木刻运动的经验，对中国木刻给予

了高度评价。这个消息和大会一百名日共美术家给中国美术家的致敬信，都是由岛田政雄转给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的。1979年他作为日中友协全国总会的常务理事和《日本与中国》报的主编，积极参加了为恢复中日版画友好交流而筹备的中国现代版画展工作。

菊地三郎先生于1904年2月9日生于东京。1923年到上海，1931年任职于朝日新闻社。1945年日帝投降后任《改造日报》顾问，开展日本民主化运动。1946年5月回国后，在东京创立中日文化研究所，大力介绍中国木刻。1947年鲁迅逝世十一周年期间，组织全日本新木刻运动会议。据中日文化研究所1950年的第一号《所报》报导，1947—1949年，已在日本举办过中国版画展达三百次，对中国木刻在日本一度出现的“中国版画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曾出版有《中国木刻集》（1949）、《现代中国小说集》（1952）、《中国短篇小说集》（1953）、《中国现代文学史》（1953）、《中国文学入门》（1955）、《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史》（1973）等等。菊地夫人渡边和子女士，也是介绍中国木刻的活动家。她于1920年生于日本京都，1942年毕业于津田塾大学。战后在上海任《改造日报》记者，归国后与菊地先生等共同创立中日文化研究所，1971年脑溢血病逝。菊地先生现任亚非语学院院长，在日本建立了“郭沫若文库”，是郭沫若同志在日本的挚友。

尾崎清次、岛田政雄、菊地三郎诸位朋友们对鲁迅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历史意义，都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在中日版画友好交流活动中的业绩和贡献，为中日版画交流增添了光彩，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自1979年恢复了被“四人帮”破坏了中

日版画的友好关系以来，中日版画友好交流的活动出现了使人感到鼓舞的新形势。在西日本，日本华侨和日本朋友们在著名人士黑田寿男、荒川义雄、陈舜臣、平山郁夫等人赞助下，自1979年筹备和组织了一个专门介绍和展览中国版画的事业单位——中日友好画廊，得到中国版画家们的支持，积极开展版画的友好交流活动。在东日本，以研究家小野田耕三郎为中心，于1980年成立中国版画之会，举办了一系列中国版画展。1982年，日本友谊旅行社社长陈东华与日本朋友们合作，组成日中艺术交流中心，在大阪、神户、冈山、广岛等地，也举办了一系列中国版画展。1982年9月，以团长饭野农夫也、副团长小野田耕三郎率领的日中版画友好交流代表团，访问了我国首都北京、成都、重庆、大足、宜昌、武汉、南京与上海等地，受到我国版画家们的热烈欢迎。此外，日本版画教育家大田耕士，著名版画家北冈文雄、关野准一郎、井上员男、冈本省吾也分别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和开展讲学活动。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日版画的友好交流活动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深信这次《鲁迅与木刻》的译本在中国出版，是中日版画友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必将载入中日版画友好交流的史册上。

周 燕 丽

1983年6月于北京